最后的铜火 黄国的兴与亡

——《春申君传奇》①

沈国冰

楚文化大家谈
（第三季）征文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黄国在淮水畔建立城邦，历代国君励精图治。黄国工匠铸造的精美青铜器受到列国喜爱，黄国迎来青铜时代的繁盛。

楚国崛起引发诸侯警惕，黄国国君在盟会上与齐桓公结盟。然而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渐生裂纹，恰似黄国国运暗伏的巨大危机。

楚军压境时，黄国上下绝不屈服，青铜作坊昼夜不停赶工打造兵器。工匠赫然发现青铜配方掺入杂质，这暗喻着黄国国家根基已悄然动摇。

楚军发动总攻，黄国国君在城头擂响青铜战鼓。城破之际，青铜作坊的炉火渐渐熄灭，工匠将尚未完工的青铜器沉入淮水，试图为黄国留存最后的文明火种。

多年以后，幸存的黄国工匠在楚地重开作坊，楚国工匠不禁惊叹于黄国高超的青铜技艺。

纵使历史蒙尘，黄国青铜器的光芒仍在岁月流转中未曾消散。

1.序章 黄帝后裔的东方封国

在春秋时代的淮河流域，有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诸侯国——黄国。

它并非大国，却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了独特印记。

黄国的历史，如同一枚被岁月磨蚀的青铜器，虽已斑驳，却仍能让人窥见昔日的荣光与沧桑。

据《史记》《左传》等历史文献记载，黄国为嬴姓诸侯国，相传是黄帝直系后裔伯益的后人所建，与东夷部落渊源深厚。伯益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，被舜赐姓嬴，成为嬴姓始祖。西周初年，周王室分封诸侯，黄国凭借先祖功绩受封于淮河上游，立国于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一带，成为周王朝在东南方向的屏障之一。

黄国的地理位置颇为特殊：北接中原，南邻楚国，东靠吴越，西连随(曾)、申等国。

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，既让黄国坐拥交通要道之利，也使它沦为大国争霸的前沿阵地。

春秋初期，黄国尚能以独立姿态存续；但随着楚国崛起，它的命运便如风中残烛，忽明忽暗，摇曳不定。

2.兴起 青铜时代的光耀辉煌

四个赤膊的黄国男子将陶范稳稳扣合，熔化的青铜液顺着浇口注入范腔。汗珠沿着工匠的脊背滚落，在夯土地面砸出深色印记。忽然云层裂开缝隙，阳光直射在刚刚成型的青铜觥上，那些蟠螭纹竟似活过来一般，在器身流转游走。远处传来巫祝的骨笛声，属于嬴姓黄氏的城邦就此立稳根基。

黄国国君伯谦站在新落成的四方城中，手指拂过城墙的版筑痕迹。夯土中掺着碎陶与蚌壳，在暮春的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

青铜作坊的烟火十年未熄。当来自江汉的绿松石镶嵌进兽面纹的眼窝，当南海的砗磲点缀在方彝的棱角，黄国的青铜器已沿着淮水行销列国。齐国的盐商带着东海明珠而来，晋国的马队驮着太行玉石而至，他们在四方城的市集交换这些闪着幽光的器物，仿佛在交换散落的文明碎片。

“君上，楚人又在南境增兵。”竹简在案几上散开，像片片凋零的竹叶。伯谦摩挲着腰间玉璜——那是周天子赏赐的赤璋改制而成。“加强城父的戍守，”他蘸着朱砂在羊皮地图上画圈，“让工匠再铸三百支箭镞。”

黄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，兼营渔猎。淮河流域水土丰饶，适宜耕种，黄人亦擅长制陶、纺织。此外，因地处南北交通要冲，黄国与中原诸夏及南方部族均有贸易往来，逐渐成为区域性的商贸中心。

在政治上，黄国虽为子爵小国，却拥有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。国君称黄子，下有卿、大夫等贵族辅政。黄国曾与周王室保持良好关系，西周晚期，黄国国君还曾多次赴镐京朝觐，以表忠诚。

然而，黄国的安稳并未持续太久。

春秋时期，周王室日渐衰微，逐渐失去对诸侯的掌控力与号召力，诸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。雄心勃勃的楚国势力如狂潮般崛起，其称雄南方、进而图谋中原的宏图霸业，已然清晰可见。

黄国的命运，自此开始走向转折。

3.危机 楚国的壮志雄心

从楚武王熊通开始，楚国称雄南方的壮志雄心逐渐显露。彼时，远在淮水流域的黄国，尚未成为楚武王的主要目标——他的核心战略目标，是位于汉水流域的“汉阳诸姬”之首随国。

这是因为，楚国要称雄南方，必须控制长江中游的铜、锡等有色金属产地；而要控制这些产地，就必须击败扼守要道的随国。

公元前704年夏天，楚武王熊通邀约诸侯在沈鹿（今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东）会盟。但随国、黄国均未赴会。黄国距离沈鹿路途遥远，缺席尚有情可原；随国与沈鹿距离相近，却刻意缺席，难免有藐视楚国之嫌。

楚武王以此为借口，大举兴师伐随，这便是历史上的第二次“武王伐随”。

黄国国君虽未遭遇楚军兵锋，却也遭到了楚武王的严厉斥责。

黄、楚两国的仇怨，自此结下。

楚人野心勃勃，不断吞并汉水、淮河流域的小国，如申国、息国、弦国等，黄国自然也在楚国的觊觎之列。

黄国起初试图以外交手段自保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黄国曾与江国、道国、柏国等小国结盟，共同对抗楚国。

然而，这些小国实力薄弱，联盟又松散无凝聚力，根本难以抵挡楚军的铁蹄。

黄国自知实力不敌，转而向齐国求助。

彼时正值齐国强盛，齐桓公意气风发，高举“尊王攘夷”大旗，称霸中原。黄国随即依附齐国，成为齐国“淮上盟国”之一。

齐桓公也派兵驻守在黄国附近，以此威慑楚国。

在齐国的庇护下，黄国获得了一段时期的安稳。

但齐国的保护并非长久之计。

齐桓公去世后，齐国陷入内乱，再也无暇顾及淮河流域，黄国的“靠山”轰然倒塌。

4.灭亡 楚人的最后一击

失去齐国庇护后，黄国的处境愈发艰难。

楚国趁机加紧施压，而黄国内部也渐生变乱。

据《春秋》记载，公元前648年冬，“楚人灭黄”。

更详细的记载见于《左传》：“黄人不备，楚师潜袭，一战而溃。”

相传楚军伐黄时，黄国君臣认为有淮水天险阻隔，楚人难以逾越。不料楚军趁夜渡河，突袭黄国国都，黄国仓促应战，终因寡不敌众而覆灭。

黄国灭亡后，原黄国百姓成为楚国子民，部分遗民南迁至吴越之地，成为后来黄姓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楚国在原黄国故地设置黄邑(后改设黄县)，对当地进行行政管辖与有效治理。黄国故地从此被纳入楚国版图，黄国彻底融入楚国，黄国人也成为楚人。

5.余响 黄国的历史回音

黄国虽不复存在，但其文化却未完全湮灭。

在楚国统治下，黄地仍保留着一定的独特性。考古发现显示，黄国故地出土的战国文物中，既有楚式风格，亦残留黄国旧俗，可见文化交融的痕迹。

此外，黄国的历史记忆在后世得以延续。汉代以后，黄姓成为华夏大姓之一，许多黄氏家族都将先祖追溯至黄国。唐代《元和姓纂》记载：“黄，嬴姓，陆终之后，封于黄，为楚所灭，子孙以国为氏。”

黄国的兴亡，是春秋时代众多诸侯小国命运的缩影。

在大国争霸的洪流中，小国若不能自强，便只能依附强者，最终难逃沦为牺牲品的结局。

黄国曾试图以联盟、外交求存，却终究未能摆脱被吞并的命运。

然而，黄国的历史并非全然是悲剧。它的青铜文明、商贸网络，乃至后世黄姓的传承，都印证了其文化生命力的顽强。

在华夏文明的浩荡长卷中，黄国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价值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被历史永远铭记。

江湖路远，总有重逢。

在黄国灭亡近四百年后，楚国进入楚顷襄王熊横时代。

此时的楚国朝堂上，出现了一位天赋异禀、文武双全的黄国后裔。

他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，照亮了晚楚昏暗的天幕；也成为战国晚期政治舞台上，一颗璀璨的明星。

他的名字，叫作黄歇。

（图片由本报记者张越提供）

上窑流派花鼓灯

苏登芬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
（第五季）征文

古镇上窑，不仅是名扬千载的陶瓷之乡，更是方圆百里赞誉有加的“灯窝子”——花鼓灯之乡。

在千里淮河中游，沿淮地区流传着民谣：“沿淮十八岗，岗岗都是花鼓灯乡。”

上窑距离花鼓灯大县怀远的涂山仅咫尺之遥，位于怀远、凤台、颍上的中心方位。上窑花鼓灯是千里淮河中游花鼓灯流域的重要流行品类之一，其表演形式中独特的韵律、节奏、舞蹈、唱词，与上窑的山水、风物、人情、民情密不可分。这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，注定让花鼓灯在此土壤里扎根生长，铸就了花鼓灯锣鼓的铿锵有力；火辣辣的花鼓灯艺术融入陶瓷艺人“火与泥”“水与土”的根脉，凝结成下里巴人艺术的筋骨。

正是如此，上窑花鼓灯才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，得以一代一代盛演不衰。

嘉庆版《怀远县志》记述：“窑乡人，挖煤掏炭，斫石烧灰，博泥为埴，烧造盆缸等器”之余，释放着火一样的激情。他们的舞蹈刚烈，连即兴的灯歌都透着非同凡响的雄浑苍劲。

据《凤台县志》《怀远县志》相关记载，花鼓灯历史悠久，这种粗犷、雄伟的民间艺术，宋代时已在怀远（上窑当时属怀远辖区）、凤台一带流传。上窑花鼓灯早有演员班子和锣鼓班子之分，演员班子又分伞把子、鼓架子、腊花三种角色。

数百年前，甚至千年之前，自从花鼓灯传入上窑，它的表演内容和形式便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创新。由于没有更早的文字记载，据老街高寿老人蒋治元依稀回忆，清末民初时，当地最大的灯头是赵结巴（艺名，原名不详），同行的还有他两个演腊花的儿子赵同义、赵同之，以及李文兴、蒋国功、周德成等十余人。蒋治元还提到，这个灯班早于怀远县冯嘴孜的冯国佩灯班。当年，灯头赵结巴等老艺人，每逢年过节、会期，便整班受邀登台演出，一展绝活。每次表演前，艺人们都会举行仪式：敲锣打鼓来到土地庙前，行香拜庙，祈祷神灵保佑他们的花鼓灯表演顺利。这一仪式后来被视为淮河中游最早的“安驾”活动。

在新旧交替的时代，上窑花鼓灯迎来新发展。民国年间，李少亭、李保明、陈守方、杨森昌、孙道常、蒋治祥、蒋治会、杨永乐等年富力强、技艺娴熟的艺术中坚走上前台，彼时可谓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。

上窑周边的群众爱看上窑流派花鼓灯，本土民众对兰花、鼓架的表演更是神魂颠倒、如痴如醉！班里几位灵魂人物，常被观众挂在嘴边，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：“杨永乐的浪、蒋治祥的唱、蒋治会的三节杠，李国才的舞腿羊卵脏，大鼓架顶人只管上，窑河后浪推前浪，花鼓灯今天看阿旺。”这段顺口溜自民国以来便耳熟能详。

“黄毛”是大兰花杨永乐的艺名。他男扮女装饰演少女，腰身灵活，舞姿优美：时而如蜻蜓点水，飘逸荡漾；时而如荷花迎风，娉婷婀娜，故而以“浪”闻名。

他塑造的少女形象深入人心，甚至有“黄毛就是兰花，少女就是黄毛”的说法。一次杨永乐在洛河演出，散场时观众迟迟不愿离去，还流传出“黄毛一走，睡倒九十九；黄毛回头看，起来一大半”的趣谈。

“大圈”是二兰花蒋治祥的艺名。他嗓音甜润、委婉动听，无论是开场的唱、过场的唱，还是后场小戏的唱，都拿捏得很到位，让人过耳不忘。除了爱情题材的唱段，他演绎的历史人物歌谣、山花野草小调，也让观众百听不厌。

“三节杠”是三兰花蒋治会的艺名。表演时，他站在二鼓架肩上，构成“第三层”，随大鼓架绕场走动，在空中舞动扇子、手绢，做出“春燕展翅”“喜鹊登枝”等技巧性姿态动作，惊险刺激，令人神往。

“黑蛋”是号称“神腿”的李国才的艺名。“舞腿羊卵脏”是上窑土话，意思是厉害、过劲。他的拿手绝活是快如闪电的旋风腿，以及疾如扫落叶的扫荡腿。除了舞腿，李国才的空心筋头也耍得极好，前空翻、撂后簸、后空翻、木里筋头（侧翻），还有跳跳虫、蝎子爬墙等类似现代体操的基本动作，他样样精通。

“大鼓架”是号称“顶千斤”的杨森昌的艺名。他力气极大，身上能顶、能背、能站几个人。年轻时，常有三四个灯班演员“猴”在他身上，他照样能绕场转圈行走；状态好时，身上能“叮”五到六个成年人，还能缓缓挪动脚步。

“阿旺”是花鼓灯新生代人物孙敦旺的艺名，“旺”字意指花鼓灯艺术后继有人、充满希望。孙敦旺是上窑花鼓灯团队里最活跃的成员之一，相较于清末民初的赵结巴、民国中期的“浪黄毛”等，他属于第三代艺术传人。

1953年初，安徽省民间文化研究学者董振亚一行，来淮南考察花鼓灯发展情况。在看完上窑花鼓灯队的演出后，董振亚说：“上窑花鼓灯具有‘旋风撵人’的风格，属淮河花鼓灯艺术的一个流派，既有艺术魅力，更有发展前景。”

从《淮南子》到“节气之城”：淮南的节气智慧与现代传承

代宜喜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——（第二季）征文——

霜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。此时，淮南大地寒气初凝，草木渐黄，田间水稻已完成收割，冬小麦播种正有序推进。这一节气不仅是自然时序的转换节点，更折射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农耕文明核心密码的永恒价值。作为二十四节气的重要发祥地，淮南以“节气之城”的独特身份，见证着这一古老智慧穿越时空，持续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生产生活。

淮南：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原乡与当代传承

淮南与二十四节气的渊源可追溯至西汉时期。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，首次系统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完整体系，将天文观测、物候变化与农事活动深度融合，奠定了节气文化的理论基础。2024年9月，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予淮南“二十四节气之城”称号，这座城市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创新实践脱颖而出。

淮南的节气文化传承呈现三大特征：

历史原真性：寿县古城墙、八公山地质公园等遗址，至今保留着古代观测日影的圭表遗迹，印证了“立表测影”定节气的科学传统。

生活渗透性：当地仍流传着“霜降吃柿子，不流鼻涕子”的民谚，节气饮食与养生习俗已融入日常生活。

现代创新性：寿县二十四节气馆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复原节气场景，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，实现了文化资源向旅游经济的转化。

节气智慧：从农耕指南到生活哲学

二十四节气的本质，是太阳周年运动与地球气候系统的耦合模型。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：

天文精度：春分、秋分昼夜均分，夏至、冬至太阳高度达极值，误差不超过±1天。

物候响应：蛰雷动则虫醒、谷雨至则布谷催耕，生物节律与气候变迁高度同步。

农事适配：淮南地区“清明前后种瓜点豆”“霜降采菊酿酒”的农谚，精准指导着作物轮作与资源利用。

节气智慧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更显多元：

农业生产：安徽全省通过节气预警系统，使水稻病虫害发生率下降18%，单产提高7%。

健康管理：中医“春养肝、夏护心、秋润肺、冬补肾”的养生理论，与节气物候深度契合。

文化认同：2016年，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，全球超2亿人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节气话题讨论。

天人合一：节气文化中的东方智慧

二十四节气蕴含的“天人合一”哲学，是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回答。这种智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：

时空秩序构建：将无序的自然现象转化为有序的时间体系，形成“春种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”的生产节奏。

风险预判机制：通过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起”等谚语，建立起气候–作物–灾害的预警链条。

生态伦理传承：节气民俗中的“祭灶”“社火”等活动，强化了社区对自然资源的集体保护意识。

现代启示：节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

在气候变化与城市化挑战下，二十四节气正经历从经验知识到科学体系的转型：

技术赋能：中国气象局二十四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研发的“节气AI模型”，可精准预测区域气候对农业的影响。

产业融合：淮南推出“节气茶饮”“节气文创”等衍生品，2024年节气经济产值突破12亿元。

全球传播：通过“一带一路”节气文化展，二十四节气成为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共同语言。

当霜降的寒风掠过淮南的稻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季节的更迭，更是一部活态的中华文明史。二十四节气从淮南走向全国、辐射世界的过程，印证了传统文化“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的强大生命力。在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语境下，这一古老智慧必将继续指引中国人，在遵循自然规律中、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，创造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。

《淮南子》：一部开中国科技哲学先河的华章

张纯林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
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
（第九季）大型征文

《淮南子》记载和总结了截至汉初为止古代中国在天文、地理、气象、物候、医学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机械、工艺等学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，内容丰富，体系完备，为中国古代科技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令历代学者赞叹不已。

然而，《淮南子》的宗旨不止于此，而是将这些科技成就运用于拓展“黄老道学”的哲学思维。它扬弃先秦以来部分哲学家秉持的上帝神仙、创世造物的天命论观点，以创新“黄老道学”的“大道”为宗旨，从科技与“大道”的关系、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关系、科技与个人的关系等方面，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道家宇宙自然观、社会政治观和人生价值观，为汉王朝提供“帝王之道”的理论体系，奠定重要思想基础。

可以说，《淮南子》是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以来开创科技与哲学相结合先河的重要著作，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的结晶，在中国科技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。

《淮南子》汲取截至汉初古代中国在天文、地理方面的成就，以科技与“大道”的关系为切入点，论述“道”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本源，居于最高范畴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开篇阐发其宇宙自然观：天地未形成时，混混沌沌，无形无象，称为“太始”。“道”最初呈现清虚空廓的状态，清虚空廓演化出宇宙，宇宙产生元气。元气有边际、有形态，其中清明部分飘逸扩散形成“天”，混浊部分凝结聚集形成“地”。清明之气聚合容易，混浊之气凝结困难，故“天”先形成，“地”后定形。

“天”与“地”的精气融合产生“阴阳”二气，“阴阳”二气的精华融合产生四季，四季各自的精气分散产生万物。阳气中的热气积聚产生“火”，“火”气的精华形成“日”；阴气中的寒气积聚产生“水”，“水”气的精华形成“月”。“日”“月”溢出之气的精华散逸为“星辰”。如此，天空容纳日月星辰，大地承载水潦尘埃。

“天”的形态为圆，“地”的形态为方。方的大地主宰幽暗，圆的天穹主宰光明。光明的“天”吐散阳气，火与日的光芒照耀在外；幽暗的“地”蕴含阴气，水与月的光泽蕴藏在内。太阳放射光芒施予大地，大地吸收光芒化育万物。所以说，阳气布施，阴气化育。“阴阳”二气相偏离，形成怒气便产生“风”；“阴阳”二气相交合，便形成“雨”；“阴阳”二气相迫近，感应即成“雷”，激荡而成“电”，散乱便成“雾”。若阳气强盛战胜阴气，雾便散发为“雨露”；若阴气强盛战胜阳气，雾便凝结为“霜雪”。

这便是《淮南子》的宇宙自然观，或称“天道”观。它强调宇宙是物质的，其演变过程是运动、发展、变化的，且拥有无限延伸、充满生机的空间与时间，是和谐且有规律的自然整体，不受外来精神力量干扰。这种自然规律与宇宙万物，均源自物质性的“道”，即“道法自然”。“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极”。

由此可见，《淮南子》借助当时天文、地理方面的成就阐释“大道”哲学，形成了具有朴素唯物论特质的新道家宇宙自然观。

既然“天道”和谐有序，那么人类社会又当如何？《淮南子》由“天道”自然论及“人道”，提出新道家的社会政治观。

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记载：天穹所覆盖、大地所承载、宇宙所包容、“阴阳”二气所孕育、雨露所滋润、道德所扶持的人与万物，皆源自“天地”这一共同根源。“天、地、人”同源同根，故而休戚与共。

据此，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提出：人的孔窍肢体均与“天地”自然相通。“天”有九重，人有九窍；“天”有四季十二月，人有四主脉十二经脉；“天”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十二经脉三百六十小经络。因此，“人主之情，上通于天”。若帝王施政违背“天道”，便是违背自然法则：实行暴政则多暴风，法令酷苛则虫灾频发，滥杀无辜则大旱无雨，政令违农时则阴雨不绝。

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还提及：远古时伏羲、神农二皇掌握“道”的精髓，立于天地中央，以精神融合自然造化，实现安民定邦。自然与社会均按“道”的规律运行，天下之事需遵循自然与社会规律，不妄为、不违背。秉持“无为而治”，便是坚守“大道”。“无为”即顺随事物自然规律、顺应社情民意行事，并非无所作为，而是“因势利导”——依据时势变化调整政策，最终形成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和谐政治局面。这便是《淮南子》新道家的社会政治观。

在《淮南子》看来，宇宙自然观、社会政治观、人生价值观三位一体，缺一不可。唯有实现三者统一的帝王，方能真正掌握治国理政的“大道”，“而游于无穷之地”。

因此，《淮南子》又结合当时人体医学的成就，论述其人生价值观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认为：“君人之道，处静以修身，俭约以率下。”帝王应处于静虚状态修身养性，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表率。因帝王地位如同天空中发光的日月，天下人皆瞩目凝视、侧耳倾听。若帝王不能恬淡寡欲，便无法具备完美品德；不安守初心，便难以实现远大理想；不心胸宽阔，便不能包容天下；不慈爱仁厚，便无法赢得民众拥护；不公正无私，便不能明断是非。

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亦言：从未听闻自身修养优良而国家治理糟糕之事，也未听闻自身修养拙劣而国家治理良好之事。矩尺不正则画不出方形，圆规不标准则画不出圆形。自身修养如同矩尺、圆规，从未有自身不正却能使他人端正之理。

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还提到：安宁淡漠是精神清明的居所，虚无寂静是“道”心的安居之处。若一味追求身外之物，会失去对内心精神的养护；若对事物耿耿于怀，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因此，君王应如古代圣贤般“抱德炀和”，秉持和谐万物的思想境界，“与道为际，与德为邻”，“理情性，治心术；养以和，持以适”，从而达到“至神”的最高精神境界。

由此可见，《淮南子》将古代人体医学成就与帝王个人道德修养、精神境界提升相联系，将“治身”视为“治国”的基本前提，认为“身治则国治”“家国同治”。为此，《淮南子》将“修其心，治其身”的自我修养置于外在追求之上，通过持续的内在修德，使生命成为践行“大道”的载体。

《淮南子》正是这样：借助当时的科技成就，探索以遵循“大道”为旨归的宇宙自然观，探索“天人合一”、自然与社会同构的社会政治观，探索通过修身养性达到“道”之最高精神境界的人生价值观。它指出，“大道”是宇宙的本源与运行法则，不可违逆；治国理政应秉持“大道”、顺应自然规律；“自然、社会、人”是和谐整体，帝王需效法“道”的规律，以“无为而治”为核心原则，建立“与道同出”的政治模式，从而确保汉初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。

《淮南子》将科技成就与其新道家哲学思想有机融合的研究方式，开中国“科技哲学”之先河。这一理论不仅对后世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伦理政治观影响深远，在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的今天，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。